

前 9·11 小说《玩家》中恐怖主义的伦理根源

Ethical Roots of Terrorism in the Pre-9/11 Novel *Players*

上官燕 (Shangguan Yan) 肖艳红 (Xiao Yanhong)

内容摘要: 作为前 9·11 时代美国社会现状的反思之作, 德里罗在《玩家》一书中极具智慧地预言了恐怖主义的发生, 小说的主题与文学的伦理维度紧密联系。通过对普通白领成为恐怖袭击者的心路历程解读, 德里罗揭示了普通美国民众伦理意识的缺席和对伦理身份的弃置, 凸显了整个社会由于伦理混乱导致的恐怖主义蔓延的现状, 反映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扭曲的伦理环境。《玩家》既是对前 9·11 暴力事件的现实描绘, 更是对即将发生世贸大厦的恐怖主义的深刻预见, 为读者从伦理角度反思历史和理解恐怖主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关键词: 《玩家》; 恐怖主义; 伦理身份; 伦理混乱; 伦理环境

作者简介: 上官燕, 文学博士, 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欧美文学与文化研究。肖艳红, 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 世纪美国小说中恐怖主义问题书写研究”【项目编号: 17BWW066】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Ethical Roots of Terrorism in the Pre-9/11 Novel *Players*

Abstract: As a reflection of the American social situation in the pre-9/11 era, DeLillo's *Players* predicts the occurrence of terrorism with great wisdom. With the them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thical dimension of literature, the novel becomes a representative which reflects the ethical environment of the society and predicts the spread of terrorism. Through the depiction of the journey through which ordinary white-collar workers become terrorists, DeLillo reveals the absence of eth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American public and the abandon of their ethical identity, highlights the situation of collapsed ethical orders and ethical chaos, and implies the distorted ethical environment of the whole country. *Players* is not only a real-life depiction of the violence in the pre-9/11 era, but also a foreseeing of the terrorism that happened in the World Trade Center. It provides a good example for readers to reflect on history and understand terro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s.

Key words: *Players*; terrorism; ethical identity; ethical chaos; ethical environment

Author: Shangguan Yan, Ph.D.,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Yichang 443002, China). She

specializes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yicsgy2001@aliyun.com); **Xiao Yanhong**, is M.A. candidate of English Literary Studies at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9·11 袭击事件发生以来，恐怖主义的阴霾便一直未曾散去，并且逐步从政治领域扩展到文学、艺术与文化领域。在美国文学界，作家们似乎发现了“世界突然面临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恐怖主义行为”（Houen 1）。他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以风格各异的书写讲述着 9·11 事件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影响：或以外部视角描写恐怖袭击的残酷，如布洛克的《小城》和梅苏德的《皇帝的孩子》，或是关注纽约受害者的焦虑与创伤，如德里罗的《坠落的人》和弗尔的《特别响，非常近》，或是聚焦恐怖分子的心路历程，如厄普代克的《恐怖分子》。对这类文学，人们称其为 9·11 文学。正如杨金才教授所言，9·11 文学“既可看作是文学内容，又可看作是文学形式，在一个悲情时代重新思考人类命运、自由和生命的意义”（杨金才 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9·11 文学不仅承载着对现实的反思，更承载着对历史的观照。

然而，翻阅美国文学历史，不难发现早在 9·11 事件之前，尤其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不少美国作家就已经创作出以恐怖袭击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比如托马斯·哈里斯的《黑色星期天》和保罗·奥斯特的《巨兽》。这些作品中不乏对发生在纽约的恐怖袭击事件的预见，比如德里罗在《玩家》中预言了针对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恐怖袭击。对于这一类文学作品，我们称之为前 9·11 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前 9·11 文学构成了 9·11 文学重要的一部分，研究这类文学作品对于探讨恐怖主义的产生与早期表现形式具有重要意义。

在 9·11 事件发生之后，大多数美国作家将恐怖分子的身份与美国多元族裔群体联系起来，其中尤以伊斯兰世界最为突出，比如《坠落的人》和《恐怖分子》这两部小说中实施恐怖行为的袭击者均来自伊斯兰世界。但是，在前 9·11 反恐小说中，恐怖袭击者很多都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大都属于中产阶级，不会因生活的窘迫而对社会产生逆反心理，不会体会到种族歧视带来的自卑感，更不会因国家的弱小而对世界充满敌意，他们过着许多其他国家的人们梦寐以求的生活。然而身处时代和社会的漩涡之中，他们的理性逐渐消失，伦理身份日益模糊，人性逐步堕落，最终沦落为丧失伦理意识的恐怖分子。

德里罗于 1977 年创作的《玩家》便是这一类作品的典型代表。小说中的主人公莱尔和帕米是一对生活在纽约的中产阶级夫妇，他们物质生活丰富，然而精神世界贫瘠。为了寻求双重身份的刺激，莱尔卷入了一场炸毁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阴谋，在政府机构与神秘组织之间互通情报，扮演着双面间谍的角色；帕米投奔之前结识的一对同性恋朋友，并与其中的杰克陷入婚外恋，导致后者的自焚事件。两人以玩家的姿态面对道德伦理的界限，最终沦落为

恐怖事件的制造者。

一、冷血的旁观者：伦理意识的缺席

小说开始的场景设置在一架飞行中的飞机上，一群人正在酒吧间里观看电影打发时间。屏幕上是一片平静安宁的景象，七八个高尔夫球员乘车来到了球场，他们穿着颜色鲜艳的运动服，以至于“让人产生了第二个童年的荒唐幻觉”¹（5）。然而，这和谐的场景不久便被恐怖分子的出现打破了。这些恐怖分子中有背着步枪和子弹的男人，也有背着大砍刀的女人，他们对高尔夫球员穷追不舍，直至把球员们全部杀死。然而，这场血腥残忍的暴力屠杀和高尔夫球员的悲惨遭遇并没有引发屏幕前观众们的恐惧或是同情，相反，“钢琴酒吧的这一小群观众笑了”“看着屏幕上高尔夫球员被杀害，那些坐在钢琴酒吧的人觉得既愉悦又颇具讥讽意味”（9）。显然，观众把这一恐怖场景当作笑料，或者说，当作了调味剂，以此为他们无聊乏味的平庸生活增加刺激和新鲜感。

类似的“冷血”情感也体现在主人公莱尔及他周围的人群身上。故事一开场，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工作的莱尔就亲眼目睹了同事乔治被恐怖分子枪杀的血腥场面，鲜血浸透了被袭击者的胸膛，然而在场的每个人都“神情专注”于奄奄一息的伤员，发生枪击的地点变成了“交易所里最平静的地方”（29）。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众多旁观者中的一员，莱尔的情感波动并不是出于对恐怖袭击者的愤怒，也不是为被袭击者感到惋惜，他所关注的是恐怖袭击事件本身，是枪击案背后隐藏的恐怖主义暴力行为。正如他其后加入恐怖袭击组织时对金尼尔所言，“这是何等刺激的午夜兼职。迷宫呀，诡计呀，伎俩呀，太诱人啦。想想啊，过的是双重生活”（100）。作为一个已然厌倦庸碌生活的中产阶级白人，莱尔将这次惨剧看成是通往双重生活的窗口，既能让他的生活充满刺激和乐趣，也能赋予他另一重截然不同的身份。由此，他丝毫不在意在这次事件中逝去的同事，更不会考虑这刺激场景的背后是生命的逝去和家庭的破灭，还有在整个社会中蔓延开来的恐怖幽灵。

同样表现出冷血态度的还有莱尔的妻子帕米。在与一对同属中产阶级的同性恋恋人伊桑和杰克出游的途中，帕米成功诱惑了杰克，导致杰克因为无法忍受内心的煎熬而自焚。面对杰克的死亡，伊桑陷入了深深的悲伤之中。然而作为朋友的帕米并没有表现出悲伤的情绪，“那天晚上十点钟左右走上第八大道时，她心中不无快乐”（204）。在看了一部好莱坞影片后，帕米陷入了“滔天的悲伤之中”，放声大哭，虚幻世界对她的影响远远大于现实世界，“这暗示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对她良心的控制程度之深”（Longmuir 136）。事实上，杰克的死亡与帕米有着直接的联系，然而她对杰克的逝去没有任何道德上的

1 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 DeLillo Don, *Player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引文翻译参考郭国良先生的译本，下文对该小说的引用只标注页码。

负疚感，在杰克自杀后她能够置身事外。在某种程度上，帕米正是这一事件背后的“玩家”，当自由意志超越理性意志，她身上的人性因子中的善良已经荡然无存，表现出来的是兽性因子的冷血和无情。

莱尔夫妇对待逝去同伴的态度与小说开场飞机上的观众对待高尔夫球员的态度如出一辙。在悲剧面前，他们近在咫尺，然而却表现得超脱漠然，这种对他人生命的冷漠态度与他们复杂的伦理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聂珍钊教授所言，“在文学文本中，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3）。最初，莱尔出于对秘密生活的向往加入恐怖组织，意图以恐怖分子的身份去颠覆他所厌倦的这个世界，但是中产阶级白人身份决定了他在内心深处依旧想维持其当下生活的社会体系，因而在计划好的恐怖袭击中一直处于被动摇摆的状态。这两个身份在莱尔身上同时存在却又互相冲突，使其形象显现出分裂性的特点。对帕米而言，她试图通过欲望的释放来突破日常生活的困境，由此她主动诱惑了杰克，情人身份与她原有的妻子身份产生了冲突。然而，她对杰克这个欲望客体的诱惑行为又毫无感情投入，或者说，“对于帕米而言，杰克只是一时的迷恋，一个假想的情人，能够将她从多年的感官和情感缺失中解放”（De Marco 888）。

出于对双重生活的向往和对欲望的迷恋，莱尔夫妇主动打破原本平静的生活，不惜将自己的伦理身份置于冲突之中。他们身上之所以会出现这一冲突，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更多地受到兽性因子的控制，从而导致伦理意识无法产生。伦理意识的出现首先依赖于理性的成熟，“由于理性的成熟，人类的伦理意识开始产生，人才逐渐从兽变为人，进化成为独立的高级物种”（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17）。莱尔和帕米做出的与伦理身份相悖的行为暗示着他们身上理性的光辉已经黯然失色。理性的丧失则意味着善恶是非观念这一基本伦理意识的缺席，“人同兽的区别，就在于人具有通过理性分辨善恶的能力”（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人性概念的阐释与考辨”15）。此外，作为一种意识的存在，伦理意识也体现在对他人产生同理心，并出于这一心理帮助他人，而莱尔和帕米生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里，丝毫不顾及他人的遭遇，甚至将同伴的痛苦作为摆脱单调生活的出口。由此，莱尔和帕米同飞机上和交易所里的其他看客一样，都是缺乏伦理意识的冷血旁观者。伦理意识的缺席使得他们无法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因而陷入了伦理困境。与常人不同的是，深陷困境的莱尔夫妇并没有试图从中摆脱，因此在危机爆发时刻，他们以“不选择”来应对所有的伦理选择。

二、婚姻的背叛者：伦理身份的弃置

如果说对他者的不幸所表现出的冷漠源自莱尔夫妇伦理身份的冲突和伦理意识的缺席，那么对婚姻的背叛则表明他们对伦理身份的背弃。自人类社会存在开始，每个人在社会中就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些角色赋予个体不同

的伦理身份，对人物伦理身份的分析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重点之一。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和纽带的体现，伦理身份约束着个人的道德行为，“伦理身份是评价道德行为的前提。在现实中，伦理要求身份同道德行为相符合，即身份与行为在道德规范上相一致”（《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4）。当个体的行为不符合伦理身份所约束的道德行为时，伦理身份就会发生变化，从而导致伦理混乱。随着故事的发展，莱尔夫妇的婚姻关系在乏味的日常生活中逐渐冷淡，“最近她发觉他们性生活的调剂通常都是别人提供的”（70）。当他们愈发难以忍受生活的沉闷时，在婚姻关系续存的状态下，他们都分别突破了伦理禁忌。正如帕米因背叛婚姻弃置了作为妻子的伦理身份，莱尔为了能够深入恐怖组织，先后与两名女恐怖分子有了亲密关系，这使得他除了拥有丈夫这一伦理身份外，又多了一重与此无法调和的婚外情人身份。同样弃置伦理身份的还有同性恋人杰克，虽然他与伊桑并没有明确的婚姻关系，但是他们之间稳固的恋人关系看似比婚姻还要坚定，正如杰克不断提到“我的一生啊。他愿意负责”（170），暗示他已然把伊桑当成了只有在婚姻关系中才可能存在的稳定伴侣。在主观上，杰克并不愿意破坏与伊桑之间的伴侣关系，然而他最终没有抵挡住来自帕米的诱惑，这一逾矩行为的直接结果是杰克背弃了其作为伊桑爱人的身份，使得他们的伴侣关系遭遇巨大危机。

经历了一系列的事件，莱尔夫妇和杰克各自弃置了自己作为伴侣的伦理身份。“在文学作品中，伦理身份的变化往往直接导致伦理混乱”（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21），对伴侣身份的弃置将莱尔夫妇和杰克置于更深层次的伦理混乱之中，然而他们对此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由于伦理意识的缺乏，莱尔夫妇对婚外恋情毫不在意，反而继续寻找生活的“乐趣”：莱尔继续深入他的秘密恐怖活动，帕米则毫无愧疚地继续与伊桑和杰克相处。然而，杰克却身陷困境难以自拔，发生出轨事件之后，杰克陷入了深深的道德愧疚之中，变得喜怒无常，“他把一切看作谴谪和失势。然后，他又反过来谴责他人，常常是生闷气，愁眉苦脸”（173）。在与伊桑的关系中，杰克有着偏女性化的气质。但是当帕米引诱他与之发生亲密关系后，把他推入了男女关系之中，他承担起了男性的角色，“他感觉他生命中唯一有意义的关系被破坏了”（Johnston 268）。这一变化导致的结果是杰克同时兼具同性恋人和异性恋人的身份，这两个伦理身份之间存在的无法调和的矛盾决定了杰克难以面对支撑其生活信念的伊桑。此外，与帕米的关系使得杰克连自己与生俱来的性别身份也模糊了，他的内心深处产生了如此严重的伦理混乱以至于最终引火自焚。

莱尔夫妇和杰克在各自的伴侣关系中承担的伦理身份意味着他们的出轨行为都是非道德的。当他们放弃了各自的伦理身份时，便意味着放弃了这一身份所带来的伦理责任和义务，意味着对当时社会中业已形成的伦理秩序的破坏，导致了伦理混乱的产生。面对伦理混乱的恶果，杰克选择以极端自残

的方式来弥补道德上的愧疚，而莱尔夫妇则选择冷漠置之，任由他人为自己的行为承受苦果，自己则成为伦理秩序的玩家。

三、恐怖主义的传播者：伦理混乱的蔓延

一个人从形式上的人成长为道德的人，必须要经过伦理混沌、伦理启蒙和伦理教诲的过程，否则就与兽无异。“每一个人，都要经过伦理混沌的阶段，每一个人，都需要伦理启蒙”（《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57）。一般而言，伦理启蒙针对的是婴儿，然而它对任何年龄阶段的人都能发生作用，“一个人只要缺乏伦理选择所需要的任何知识，他都需要伦理启蒙”（《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58）。如果说一个儿童经历伦理启蒙并形成伦理意识的过程主要是来自原生家庭的影响，那么一个成年人的伦理意识自然受到社会大家庭潜移默化的教诲。莱尔的行为并不是个例，他身上所体现的伦理意识的缺席和伦理身份的弃置与他所处社会的伦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因为整个社会失去了伦理教诲的功能，人们才陷入了一种缺乏伦理意识的麻木状态。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伦理秩序处于坍塌的边缘，朱迪斯·巴特勒曾对那一时期的公众归属感做过评价，“在越战期间，正是汽油弹烧死儿童的图片让美国公众感到震惊、义愤、悔恨与悲恸。这些图片是我们原先根本看不到的，它们冲破了视觉领域，动摇了所有基于这一领域建立起的公众归属感”（朱迪斯 240）。公众归属感缺失所造成的直接结果是个体无法定位在社会中所拥有的伦理身份，进而陷入了伦理混乱之中，善恶是非观念更加模糊，无法根据伦理秩序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自由意志在与理性意志的博弈中逐渐占据上风。

理性意志本应“以善恶为标准约束或指导自由意志，从而引导自由意志弃恶从善”（《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79），在小说中，莱尔夫妇身上的理性意志却往相反的方向发展，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越来越脱离理性意志的控制，以不可逆的趋势为自由意志所驱使，而他们的伦理身份也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加复杂含混。在莱尔和帕米分开后，他们各自通过不同的方式寻找生活的出口：莱尔既是一场恐怖袭击的见证者，更是这一恐怖组织的积极参与者，在得知交易所里的恐怖分子携带炸弹之后，他想方设法地去接近乔治背后的恐怖组织。当他终于联系上了以金尼尔为首的恐怖分子并了解了他们的破坏目的时，他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我喜欢，我喜欢，我报名”（101）。然而，随着事情的发展，他发现金尼尔的恐怖集团没有严密的组织和周全的袭击计划，由此，他最初的激情也开始慢慢冷却，为了对抗这百无聊赖的生活，他将恐怖分子的信息透露给政府人员，在两个对立的组织之间传递信息。在整个故事发展过程中，莱尔的身份始终处于游移不定的状态，他首先是一场恐怖袭击的目击者，随后接替受害者成为了恐怖组织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联络人，拥有了恐怖分子这一身份，最后他作为“双面间谍”将情报在恐怖组

织与政府人员伯克斯之间进行传递，这一行为使得他同时具有了恐怖分子和“秘密警察”的身份。尽管这两种身份处于一种“非此即彼”的紧张关系之中，但是莱尔却在这两种身份之间不停转换且游刃有余，不仅使其形象显得荒诞离奇，更使其身份变得捉摸不定。

小说的最后，莱尔为了进行恐怖袭击活动，来到了加拿大的一个汽车旅馆等待金尼尔，金尼尔是否会到来是不确定的，但是从莱尔的行为来看，他已准备好了匿名身份去摆脱这一切。在结尾处，莱尔呈现了这样一种模糊的形象：“这位上身撑起的人几乎不被认作是男性。除却才能和个性，他仍可形容为身材标致、眉清目秀、感觉敏锐。除此之外，我们对他一无所知”（212）。经历了一系列相互矛盾的角色转换后，莱尔最终的身份仍是未知，甚至连基本的性别角色也渐渐暗淡，最后的匿名身份暗示着他将继续以不确定的角色在社会中传播恐怖幽灵。恐怖活动仍在继续，莱尔既出入其中又游离其外，他制造恐怖因素的事实无法被磨灭，他的善恶是非观已荡然无存，就如一个玩家一样操纵着整个恐怖游戏的进程。“社会混乱通常与具有潜在威胁的陌生人的行为有关”（Ruggiero 58），莱尔就是这样一个对社会造成威胁的陌生人，他亦是时代的一个缩影，在整个社会都处于伦理混乱的情形之下，无数个像莱尔一样缺乏伦理意识的民众成为了具有潜在威胁的陌生人，在匿名身份的掩饰下，他们成为了伦理混乱的制造者和恐怖主义的传播者。

与莱尔不同的是，帕米并不是有意去制造恐怖，但是由于受到自由意志的驱使，她身上的兽性因子在逐步操控她的行为。“这些年来，无论在哪儿，她老是听到人们说这说那……‘只要自己觉得对就行。’他们说。他们还说：‘听从你的本能，做你自己的主人，让幻想成真’”（143）。一个人的行为如果听凭原始本能的驱使，那么原有的建立在理性之上的道德观念就会坍塌，人性也会逐渐迷失。这暗示着帕米身上的自由意志正在逐步脱离理性意志的控制，导致她无法分辨对错，在诱惑杰克之后使其伦理身份混乱，从而陷入伦理困境：杰克是爱伊桑的，然而他也无法拒绝帕米的诱惑，他的思维如此混乱以至于他的言辞“汇成一阵持久的噪音，混杂着怀疑、憎恨和抗议的成分”（175）。最终他不堪内心的折磨，选择以自焚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干瘪失色，从肌肉到肌腱，从神经到血管，一直到骨髓，全身都烧焦了”（198）。在缺乏正确的伦理意识引导的情况下，作为摆脱伦理困境的手段，杰克的极端自残行为给在场的人们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恐怖阴影，这阴影随着冒着青烟和酸腐的气味逐渐在社会中蔓延开来，由此造成了更加严重的伦理混乱。

在某种程度上，媒体为恐怖主义的传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小说开场，电影中暴力血腥的场景给飞机上的看客们留下深刻印象。此外，恐怖分子金尼尔的身份也异常神秘。作为恐怖组织的领导人，金尼尔进行恐怖活动的根本目的只不过是想要让骚乱暴露于公众视野之中。他本人没有鲜明的政治倾向，也不是为了获得某种经济利益，他的攻击没有明确的目标，他的

行动几乎毫无计划，他的整个活动也没有对社会造成很大的破坏。他甚至也与莱尔一样，在恐怖组织与情报人员之间扮演双面间谍的角色。那么，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正如他所说，“无辜的人死的死，残的残。目的是什么呢？宣扬这场运动，就这样罢了。又是媒体。他们想要报道”（180）。宣扬恐怖活动，使其成为媒体肆意渲染和广泛报道的对象，从而成为“争取自身可见度的直接努力”（Zizek 77），通过这样的方式将恐怖主义的幽灵迅速扩散到整个社会。恐怖主义“与大众媒体相伴相生，因为他们都需要戏剧化的、暴力的场面来激起公众的兴趣。两者互为对方提供和接受服务”（Schneck & Schweighauser 84）。一方面美国大众媒体需要恐怖主义的素材来刺激人们麻木的神经，另一方面恐怖主义需要美国大众媒体的镜头来尽可能放大其在人群中的影响，当两者互为依赖，恐怖主义在大众的视野中便愈发频繁地出现，而恐怖主义的阴霾也随之扩散开来。

在鲍德里亚看来，恐怖主义如病毒一样无处不在，“随时准备着激活自身，扮演着双重间谍的角色”（Baudrillard 10），当社会陷入越来越深刻的伦理混乱而失去伦理教诲的功能时，无数个像莱尔一样的美国人回到了伦理混沌的状态，由于得不到来自社会的伦理关切，他们无法分辨善恶，对自己所目睹的或所引起的恶没有伦理意识，正是在这样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下，他们继续向社会散播恐怖主义的种子。为了实现他们作为白领阶层的“隐秘的梦想”，他们将自身的伦理身份置于不断的转换甚至冲突之中，使得整个社会陷入日益加剧的伦理混乱。当作为阴影而存在的恐怖主义被无限放大，越来越多的人就会成为恐怖主义的传播者，一旦恐怖主义的影子延伸至极限，最终造成的结果只会将社会制度本身吞没。

四、时代的受害者：伦理环境的扭曲

文学伦理学强调文学与其产生的历史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有其固定的属于特定历史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对文学的理解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这是理解文学的一个前提”（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19）。在莱尔所处的环境中，无论是飞机上的观众，还是交易所里的看客，都同他一样，冷冷地看着周围的人被残忍地杀害。因此只有对莱尔所处时代的伦理和道德观念进行细致的剖析，才能阐释这一现象所产生的伦理根源。而这一点正是德里罗通过小说想要表达的真正主题，“最新的英语恐怖主义小说与恐怖主义本身并无多大关系，它所关注的是恐怖主义受害者所属社会的政治合法性和道德完整性”（Appelbaum & Paknadel 397）。

纵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冷战、征兵、核武器以及越南战争使得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意识到这个国家已经不似从前。在外部，美国政府打着保护国家安全的旗帜大肆武力干涉他国内政，“美国人会为维护其强

权地位不惜代价，美国政府喜欢在保卫国家安全的口号下使用战争手段，民众也会在爱国的旗帜下支持政府的决策”（熊志勇 51）。然而，随着政府在频频发生的战争上花费的财力和物力越来越多，美国人民渐渐发现威胁自己安全的不是其它国家，而是自己所信任的美国政府。美国政府所谓的为国家安全而战不仅给交战国带来了沉重灾难，更让美国人成为了滥杀无辜的恶魔，美国的身份由受害者变为了侵略者，他们所期待的形象和实际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落差，原有的是非善恶等道德准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有的伦理秩序也被推翻，国家形象陷入了坍塌的边缘。美国政府承诺给人们一个比乌托邦还要完美的世界，而这个美国梦已然破碎，梦想的破碎带来的是个体的空虚和恐慌，不仅冲击着传统的社会结构，也对普通民众的个体成长、家庭伦理产生了影响，美国社会本身也已陷入了深重的伦理混乱之中。

美国政治环境的扭曲深刻影响着身在这个国家的公民：年长的一代伦理观念被扭曲，年轻一代的伦理意识无法形成。在这样复杂的伦理环境下，莱尔所代表的正是那一个迷惘的群体，他们无法分辨是非善恶，也因此失去了人性因子的光辉。作为自由意志控制下的麻木旁观者，他们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随意弃置或转换自己的伦理身份，甚至将他们所看到的暴力与恐怖在混乱的社会中传播开来，却又出于本能的恐惧而逃离恐怖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莱尔所表现出的伦理意识的缺席和恐怖主义倾向是整个社会大环境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也是时代的受害者。

恐怖主义是德里罗的作品中一以贯之的主题。在《玩家》中，从开场电影中的高尔夫球员被残忍杀害，到纽约证券交易所里莱尔的同事被枪击，到帕米感觉“那飞机看上去像要碰撞了”（84），再到莱尔加入恐怖组织，直至最后帕米引诱杰克导致后者引火自焚。可以说，恐怖主义的阴影贯穿整部小说的始终。就其社会根源而言，这与美国政府的行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莱尔在恐怖主义事件中的“玩家”行为如同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影子，将别国的生死置之度外，同时又能够将自己抽离其中，全身而退，让无辜的人为此饱受身心的折磨和迫害，正如齐泽克所说，“美国的和平是通过其它地方的灾难换来的”（Linke & Taana Smith 77）。以越南战争为例，“士兵带着崇高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来到越南，但战争的现实却让他们惊恐万分”（胡亚敏，李公昭 91）。无辜的平民被肆意杀戮，牺牲在战争的炮火之中，战场上的美国士兵发现自己已经一步步成为冷血无情的杀手，“他们慢慢体会到理想的幻灭，失去了当初的天真与浪漫，感受到人性的丧失和道德的沦陷”（胡亚敏，李公昭 91）。战争在给普通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也让经历了战争的士兵们饱受道德的谴责，从“自由斗士”到“冷血的刽子手”的伦理身份转换也让他们陷入了深深的伦理混乱之中，可以说，饱受战争创伤最深的是美国公民。阿伦特在《共和的危机》中对越战曾做过这样的评价：“在越战这件事中，除了谎言和混淆视听之外，我们还遭遇到对相关历史背景的无

知……”（阿伦特 24），从这一点上来看，美国政府又何尝不是恐怖主义的“玩家”？

结语

莱尔夫妇无疑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中产阶级群体的缩影，德里罗在一次采访中也曾提到，“我认为这两个角色在当代美国人中更具典型性”（LeClair 22）。莱尔和帕米身上同时拥有复杂而矛盾的伦理身份，这种伦理身份的冲突使其人物形象显得分裂而荒诞。然而，正是通过对这种人物形象的构建以及多重伦理身份的塑造，个体伦理意识的缺席、家庭伦理身份的弃置和社会伦理混乱的现状才得以凸显。在伦理身份的冲突之下，莱尔和帕米身上体现出兽性因子的冷血和麻木，使得他们无法根据确切的伦理身份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因此以冷漠来面对所有的伦理困境。伦理身份的弃置让他们对婚外越轨行为毫不在意，反而让他人来承担伦理身份混乱的后果，从而对家庭伦理秩序造成了严重破坏。

自始至终，莱尔夫妇的身份因为不断的变换而更加模糊，以至于最终呈现为匿名的状态，伦理身份的匿名使得他们毫无顾忌地在社会中制造混乱，加剧了社会伦理环境的恶化。与此同时，已然扭曲的伦理环境决定了这个社会已无法再发挥伦理教诲的功能，无法引领正确的道德观念，更无法引导人们分辨善恶，这一现状决定了他们不仅对自己的社会处境缺乏正确认识，也对恐怖事件的本质缺乏清晰的认知。最终，人性以不可逆的趋势在不断堕落，在个体丧失伦理意识的情况下，他们在社会中制造各类恐怖事件，而对恐怖景象本能的恐惧和对他人的冷血又让他们在恐怖事件发生时能够全身而退。他们是伦理秩序的破坏者，是恐怖主义的制造者与传播者，更是扭曲的伦理环境的受害者。

在某种程度上，德里罗对恐怖主义的批判不是针对个体良知的泯灭，而是从整个时代的视角出发，审视恐怖主义产生的伦理根源，这种审视可以从其小说标题《玩家》中管窥一斑。作为一个有着移民身份的旁观者，同时也是这个社会的参与者，德里罗通过《玩家》对恐怖主义早期表现形式的伦理根源进行了生动的诠释，从而凸显了小说作为叙事性文体的历史维度。

Works Cited

- Appelbaum, Robert and Alexis Paknadel. "Terrorism and the Novel, 1970–2001." *Poetics Today* 3 (2008): 387-436.
- 汉娜·阿伦特：《共和的危机》，郑辟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 [Arendt, Hannah. *Crises of the Republic*. Trans. Zheng Pirui.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3.]
- Baudrillard, Jean. *The Spirit of Terrorism*. London: Verso, 2003.

朱迪斯·巴特勒:《脆弱不安的生命——哀悼与暴力的力量》,何磊 赵英男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

[Butler, Judith. *Precarious Life—The Power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Trans. He Lei and Zhao Yingnan. Zhengzhou: Henan UP, 2013.]

DeLillo, Don. *Player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引文翻译参考郭国良先生的译本。

De Marco, Alessandra. “‘Morbid tiers of immortality’: Don DeLillo’s *Players* and the financialisation of the USA.” *Textual Practice* 5 (2013): 875-898.

Houen, Alex. *Terrorism and Modern Litera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胡亚敏,李公钊:“从幻想走向噩梦的深渊——论美国越战小说”,《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2004): 89-94。

[Hu Yamin and Li Gongzhao. From Illusion to the Heart of Darkness: On American Vietnam War Fiction. *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1(2004): 89-94.]

Johnston, John. “Generic Difficulties in the Novels of Don DeLillo.”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4 (1989): 261-275.

LeClair, Thomas. “An interview with Don DeLillo.”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 (1982): 19-31.

Linke, Uli and Danielle Taana Smith. *Cultures of Fear*. New York: Pluto Press, 2009.

Longmuir, Anne. “Genre and Gender in Don DeLillo’s *Players* and *Running Dog*.” *Journal of Narrative Theory* 1 (2007): 128-145.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 12-22。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Its Fundament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10): 12-22.]

——:“文学伦理学批评:人性概念的阐释与考辨”,《外国文学研究》6(2015): 10-19。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e Exposition and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Definition of Human N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 (2015): 10-19.]

Ruggiero, Vincenzo. *Visions of Political Violence*.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Schneck, Peter and Philipp Schweighauser. *Terrorism, media and the ethics of fiction-Transatlantic perspectives on Don DeLillo*. New York: Continuum, 2010.

熊志勇:“美国公众舆论与战争——以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为例”,《外交学院学报》3(2004): 45-51。

[Xiong Zhiyong.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Wars: Case Studies of Korean War, Vietnam War and Iraq War. *Journal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3 (2004): 45-51.]

杨金才:“关于后“9·11”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外国文学动态》3(2013): 4-5。

[Yang Jincai.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Researches of Post-9/11 Literature.” *World Literature Recent Developments* 3 (2013): 4-5.]

Zizek, Slavoj. *Violence: Six Sideways Reflections*. New York: Picador, 2008.